

当代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女性裹脚形象解读

何木英

内容提要 本文对中国妇女的裹脚形象在当代西方文学界风行的现象和原因作了探讨。文章指出,马可·波罗、胡迪、赛珍珠等的成功对当代西方文学中的裹脚形象风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裹脚形象为张邦梅、多罗西·科和张戎的作品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内作家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英文版在美国也大受欢迎。裹脚形象风行的主要原因是它满足了西方读者和评论家的“东方主义”认识体系、审美情趣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 当代西方文学 裹脚形象 风行原因 东方主义 审美情趣 女性主义批评

中国妇女的裹脚又称缠脚、小脚和三寸金莲,始于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到宋代得到普及,及至明、清时代成了女性美的典范。晚清时期,封建社会走向衰落,受国内进步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裹脚失去了市场。1911年官方开始废除裹脚,尽管几经反复,“小脚丑”的观念从晚清到民国初期已基本上成功地建立起来。1993年,在“国际卫生组织”和其他组织及部门的支持下,斯狄文·R·康明斯和凯笛·司通对北京的老年妇女裹脚进行调查研究。在随意抽查的206位70岁以下的老人中,仅有一位裹脚,因此,这部分年龄被排除在研究之外。^①由此可见,中国妇女裹脚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成功废除。然而,在当代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中,裹脚仍然是热门话题。

东方妇女在西方的形象可追溯到13世纪的马可·波罗时代,在他的著作中,东方妇女的身材引人注目,高雅,精巧。到1826年,托马斯·胡迪写了一篇论文《茶杯之幻想》(Thomas

Hood, *Fancies of a Teacup*),其中描写了一位中国美人那双“几乎看不见的小脚”。“由此可见,从胡迪开始,小脚就开始成为东方妇女的西方形象的一部分”。^②

20世纪上半叶,赛珍珠的成功为当代西方文学中裹脚描写的风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赛珍珠的叙述中,尽管官方开始废除裹脚,老百姓仍然崇尚这一习俗。在《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吴女士的闺阁》(*The Pavilion of Woman Madame Wu*, 1937)等小说中,赛珍珠都描写了裹脚女人的形象。欧兰的大脚即是中国农民妇女形象的象征,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她以土地为伴,过着艰辛的、粗蛮的生活。相反,吴女士却有一双精致的、曾经缠过又放过的小脚,她被缠在家里,为人妻,为人母。

赛珍珠的作品是伤感情的,甚至是负面的。很多读者和评论家认为,她描写了中国负面的东西。陈咪咪在《在西方人眼中: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妇女形象》(Mimi Chan, *Through the Western*

Eyes: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1989) 中指出, “……她仅仅描写中国最糟最落后的方面, 这伤害了面子观。不管中国人, 欧洲人或者美洲人, 这样做本身就是伤感情的。”^③赛珍珠被西方国家称为“中国通”, 但她的许多作品都没有反映出中国的真实面貌, 常常流露出对旧中国的怀念, 对儒教文化的怀念。然而, 西方读者却从她的叙述中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认识中国妇女和她们的裹脚。1932 年, 《大地》获普利策奖, 1938 年, 赛珍珠因为创作了描绘“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真挚坦率的史诗”和“传记文学的杰作”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④也许因为这种风俗对西方而言非常异国化, 非常野蛮, 裹脚/放脚主题在赛珍珠的作品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⑤“赛珍珠成功地赢得了西方的读者和听众。在她之前没有谁使中国人如此具体化, 个性化, 而她的人物由于他们的异国、遥远而受到保护。”^⑥赛珍珠不仅赢得了西方的读者和听众, 也迎来了众多的追随者。

当代西方文学中, 裹脚已成热门话题之一, 它是许多作品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戎的《鸿: 中国三女儿》(Jung Chang, *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1992)、张邦梅的《小脚与西服》(Pang-Mei Natasha Chang, *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 1997)、多罗西·科的《一步一朵莲花: 裹脚之鞋》(Dorothy Ko, *Every Step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1998)、哈金的《等待》(Ha Jin: *Waiting*, 1999) 等涉及裹脚的作品引起了西方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与极大兴趣。冯骥才的《三寸金莲》英译本在美国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鸿: 中国三女儿》描述了张戎、她的母亲和祖母三代女性以主观的眼光看到的近代中国史, 时间跨度为 1909 年至 1978 年, 经历了清朝灭亡、军阀混战、日本侵略、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作品的第一章就是“三寸金莲: 一位军阀的小妾, 1909 - 1933”。《鸿》使张戎名利双收。该书被誉为 20 世纪销售量最高的传记文学, 现已在 30 多个国家出

版, 截至 1997 年底, 共销售了 800 多万册。今年 5 月 2 日, 香港《苹果日报》引自英国《每日电讯报》消息报道: 英国《每日电讯报》与 Ottakar's 书店举办十大最受欢迎非小说书籍选举, 入围者绝大多数为感性和故事性强的个人经历, 其中就包括张戎的《鸿》。

《裹脚与西服》回忆了徐志摩及与他只有 7 年婚姻关系的“原配妻子”张幼仪的故事。徐志摩曾将他们比喻成“裹脚与西服”, 即幼仪是中国旧传统的代表而志摩是西方新思想的代表。“但是, 只有当她(张邦梅——笔者注)向读者介绍到她的值得注意的老祖母(张幼仪——笔者注)的时候, 其故事才开始真正精彩。这是丰富的家庭回忆录题材中灵巧的, 受人欢迎的附加内容。”^⑦而这位祖母的主要故事就裹脚与放脚的斗争。《小脚与西服》被认为是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美国公众健康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和《中西部季刊》(*Midwest Quarterly*) 分别将其列为“1998 年最好的书”(The Best Book of 1998)、“年轻人最好的书”(Best Books for Young Adults)。

《一步一朵莲花: 裹脚之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从历史、经济、文化等角度详细地描写了“孔夫子文化”下的中国妇女裹脚传统。作者多罗西·科认为, 中国妇女的裹脚同现代的美容外科手术一样, 是女性在男性统治社会中为了获得美和社会地位的需要。多罗西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历史教授, 对中国女性和她们的三寸金莲颇有研究, 发表过不少很有影响的文章, 如“裹脚之性”、“博物馆中的裹脚”、“皇帝时期的中国妇女”、“作为装束的身体: 17 世纪中国妇女裹脚意义的转变”等。

西方读者不仅对西方文学中的裹脚感兴趣, 对中国国内作品中的裹脚也感兴趣。1994 年,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由密苏里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威克菲尔翻译为英文,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译笔精湛, 荣获“全美凯登翻译奖”。

《三寸金莲》描写了贫家女子戈香莲的悲剧故事。香莲忍受了残酷的裹脚后有了一双三寸

金莲,而后嫁入豪门。可因赛脚失败,在家中地位一落千丈。之后虚心学习,再次赛脚中“脚压群芳”,登上了掌家媳妇的宝座。最后万念俱灰地死去。由于作品中大量列举了缠脚、养脚、评脚、赏脚、玩脚、赛脚的知识 and 关于小脚的典故、技巧、诗文,该书曾被称为“文化论文”。《三寸金莲》一出版就受到《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纽约人》(New Yorker)、《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等美国媒体的高度评价。在以后的数年中,《亚洲民俗学研究》(Asian Folklore Studies)、《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还不断地评价它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文学价值等。奥尔根大学教授温迪·拉尔森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作者给我们讲述一个具有嘲弄意味的非常精彩的故事,把裹脚作为探索中国人文化深层问题的手段。”哥伦比亚大学评论家大卫·王德维认为,“作者选择一个旁白的技巧,风格远远超出中国现代文学通常的批判现实主义。从作品的表白到内涵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既复杂又深邃的文化含义。”这部书被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先生编入他的“现代中国作家丛书”,并作为打头之作。

二

当代西方文学中中国妇女裹脚形象风行的原因,除来自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外,还来自社会、政治、文化、审美、媒体等多方面的影响,以下仅从西方的“东方主义”认识体系、审美情趣和女性主义批评方面进行考察。

1. 裹脚满足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认识体系

由于马可·波罗著作在欧洲的传播,中国一度是一个充满财富的、浪漫的、理想化的神秘国家,是让西方国家学习、借鉴的楷模。但自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人使用征服者的目光看待中国和中国文化了。随着西方的日益强盛和殖民主义的兴起,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关系发生了变化。赛义德认

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⑨所谓“东方”是被西方人“东方化”了的,“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因为它是被19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而且因为它可以被制作成——也就是说,被驯化为——‘东方的’”。^⑩东方是西方人出于对东方的无知、偏见、猎奇和政治原因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赛义德指出:“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莎士比亚(Shakespeare)或华兹华丝(Williams Wordsworth)的知识是非政治性的,而关于当代中国和苏联的知识则是政治性的知识。”^⑪在西方人眼中,裹脚具有愚昧、野蛮、缺乏理性、撩人色欲、专制、异端邪教等特点;同时也有某种迥异于他们的文化,并令他们向往的神秘、浪漫色彩。今天,在欧美等地的展览馆、博物馆,凡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之处,大都陈列有女人的“三寸金莲”模型、图片等。在他们的学校,妇女的裹脚,男人的妻妾、长辫就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代名词。这些皆为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中裹脚的风行建立了广泛的大众基础。

2. 裹脚满足了西方人的审美情趣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女性向来以柔弱、顺从、恬静、典雅、含蓄的“东方美”与他们的热情、率直、健康、阳刚等特点的“西方美”相对应。事实上,中国文化以儒、佛、道三家为主,在不同的时期,三者交替地或同时地影响我们民族的审美情趣。在繁荣昌盛的唐代,三家思想兼容并包,形成了隋、唐妇女才貌并茂、丰硕、健康、阳刚之美。唐末,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宋代以后,国势萎靡衰败,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对女性的审美观也发生了变化。随着裹脚的出现和普及,病愁瘦削、纤细孱弱、弱不禁风、小鸟依人的小脚女人成为美人典范。中国传统妇女鉴赏家认为,“三寸金莲”和随之而产生的走路像“杨柳摆腰”是女性美的最佳标准,因为它能产生一种美感,激发男人的保护感、刺激男人的快感和性兴奋。西方评论家也有类似观点。詹尼弗·鲁亚克指

出,自19世纪西方医生将欧洲的束胸比喻成中国的裹脚以来,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就非常有兴趣于两者对妇女所产生的一种美的标准——压迫美,这种美使男人从中获得快感;同时男人还能从束胸使妇女承受的痛苦中找到性感。^⑩米基尔·斯卡莱斯·苏吉亚马将现代女性穿高跟鞋与中国裹脚进行比较。她认为它们都能让女人的脚看起来更小。走路不稳的神态让男人产生一种保护感和性兴奋。“女性的脚和鞋总是奇特地、强烈地与浪漫和性连在一起”。她还引述了众多评论家的观点:“高跟鞋一定是男人们想看到的——(穿起它们)她们的臀部好看,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这样能激起男人性兴奋(欧文顿);“任何中国男人都能证明,面带惊恐、用她的三寸小脚拾步而行的女孩在男人心中产生的诱惑效果。她的左摇右晃的动态、或站立不稳的赏心悦目的外形,引发出一种无以言表的病弱的优雅的总体感觉”。这种“赏心悦目的外型”的效果来源于男人的心理(H·A·吉尔斯)。^⑪

3. 裹脚满足了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的研究取向

中国女性的裹脚和反裹脚从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家庭结构、女性生理和心理特征等诸多方面为女性主义批评者提供了有力的研究素材,因此受到他们的青睐不言而喻。

中国封建制度延续了几千年,农业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劳动分工、男权制婚姻的家庭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男尊女卑”、“夫为妻刚”、“三从四德”的女性道德规范使妇女完全成了家庭生育的工具、男性家长性欲的对象和男性的审美客体。当代西方评论家认为,裹脚的野蛮和非人性满足了他们对中国社会体系的认识——家长制和男权主义。

首先,女性的裹脚和随之产生的行动不便、柔弱病态等生理变化将她们最好地禁锢在家中。苏桑·格林霍夫认为,一千多年以来,中国妇女忍受了裹脚与残废的痛苦。这种怪诞的三寸金莲之美展示了财富、不朽的家长制和女人寻找丈夫的途径(认为“大脚女人”不能嫁

人)。^⑫鲁亚克认为,中国妇女的裹脚同早期西方妇女的束胸一样,削弱了妇女可能与男人抗衡的力气。^⑬H.A.吉尔斯认为,“中国男人像墨西哥男人一样,不喜欢他们的女人强壮”,因为残废、虚弱的女人比四肢健康的女人好控制,使男人对他们的配偶有信心。^⑭苏吉亚认为,女人是金、是玉,应该藏在家中。她们的脚被绑起来,她们就被绑在了家中,就不会进入一些不适宜的场合而失掉名节,这样才能做好母亲、好妻子、好女儿。因此,女人的脚是家族名誉、地位的象征,像欧洲妇女戴面纱、被幽禁于修道院或寺庙等一样,裹脚是女人对男人的性忠诚、性牺牲的一种表现形式。新娘的裹脚不仅对新郎具有性诱惑,也意味着新娘的谦恭、牺牲和道德精神。^⑮

第二,裹脚是妇女生存的需要,是她们征服男人的手段。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如果要生存下来,她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打扮自己、吸引男人、寻找依靠,因此男人的审美标准就是妇女自己的标准,既然男人认为三寸金莲就是美,哪怕它是残酷的、畸形的,她们也只能忍受。多罗西·科指出:“你不能认为一千多年来中国妇女都很愚笨、中国男人都性变态,你必须看看女人手中究竟握着什么赌注?”^⑯居列·白柔文分析了中国发动的“废除裹脚运动”,这场运动本来认为裹脚是卑劣的、淫猥的、无用的,是民族的耻辱,而他研究得出的结论却相反:妇女看到的是她们的裹脚中体现出来的美、道德和生产能力。^⑰鲁亚克认为,裹脚、束胸、乳罩、腰带是妇女谋生的需要,“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束胸虽然使人难受、痛苦,甚至引起一系列的疾病,但是,为了获得美,为了赢得男人,她们只能这样。刺身、纹身和在身上烧烙标记“与妇女实际上喜欢她们的裹脚没什么不同。因为它不仅改变了她们的步态,而且改变了她们认识世界的方法。她们以同样的眼光看她们的脐环或舌环: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⑱

第三,裹脚是悠闲劳动的象征,是劳动技艺的展示。裹脚的妇女仍然可以劳动,她们虽然

不能做粗重的田里活,却可以拾柴火、除草,甚至呆在家里她们也总能用丝、绸、棉做出精美的“金莲小鞋”。做绣花鞋和穿绣花鞋是她们的骄傲。鲁亚克指出:“一个好的女人用她的双手把鞋做出来,再用她的身体把她的手艺展示给大家,结果,裹脚不就成了女性工作、劳动和技巧的表征吗?”所以,当20世纪中国政府发动废除裹脚运动的时候,遭到了小脚女人的反对,“为什么她们要服从这种运动呢——它会让她们的成为废物、残废、懒人?”^{②1}

近年来,由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有关中国的文学作品引起了西方对中国文学、文化及所有有关中国的兴趣,因此这些作品不断获奖。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吴冰教授在论及哈金的获奖时指出:“华裔作家在美国得到承认,一向受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国内的状况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美国人对中国产生广泛的兴趣……对华人也更加关注。同样,在国际上,近年来华人在多个领域频频获奖,除了本身具备条件以外,无不与中国国际地位上升有关。国际授奖单位在是否给华人授奖、给哪位华人授奖的问题上,大多是考虑政治因素的,这一点不说我们也明白。”^{②2}我们希望,西方作家或批评家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客观、真实地塑造中国形象,客观、深入地评价中国文化。华裔作家们的身份里都有华人成分,与祖国同命运,与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同荣辱!作为国内读者,我们应该了解西方国家对我们文化传统接受的现状和

态度,对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学中的价值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

注释:

- ①⑧ Steven R. Cummings and Katie Stone, “Consequences of foot binding among older women in Beijing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Oct. 1997, Vol. 87 Issue 10.
- ②③④⑤ Mimi Chan, *Through the Western Eyes: Images of Chinese Women in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Joint Publishing Co. Ltd. Hongkong, 1989), p. 104, p. 167, p. 11, p. 176.
- 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 II),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 年版, 891 - 892 页。
- ⑦ *New York Today*, October 14, 1998.
- ⑧ 马季:《〈三寸金莲〉在美国》,载《文学自由谈》1994 年第 3 期, 102 页。
- ⑨⑩⑪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8, 8, 12 页。
- ⑭ Susan Greenhalgh, “Bound Feet, Hobbled Lives: Women in Old China”, *Frontiers*, 1977, 2, 1, Spring, 7 - 21.
- ⑮⑯⑰⑱⑲ Jennifer Ruark, “A Second Look at the Big Squeez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1/23/2001, Vol. 49, Issue 13.
- ⑳㉑ Michele Scalise Sugiyama, “Of Woman Bondage: The Eroticism of Feet in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Midwest Quarterly*, Autumn 99, Vol. 41 Issue 1.
- ㉒ Julie Broadwin, “Walking Contradictions: Chinese Women Unbound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997.
- ㉓ 吴冰:“前言”,载《美国全国图书奖获奖小说评论集》,吴冰、郭棣庆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版, 11 - 12 页。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何 卫